

▼彬县县城周边的路上满是黑色煤渣。

本版图片均据北京《中国青年报》

▼小龙家的平房和院子。



▼案发地开元广场。



6月16日，陕西省咸阳市彬县的中心广场发生了一起命案，死者是一名流浪汉。警方判断是谋杀，可是谁会谋杀流浪汉？最后，警方惊讶地发现，作案嫌犯是5名少年，其中，最大的不过16岁，最小的只有13岁。

少年告诉警方，他们正在谋划抢钱，可是几个人由于胆小一直没敢动手，就“拿疯子练练手”。而抢劫的目的，竟只是为了买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。

这起犯罪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台湾电影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，看似简单得近乎天真的动机背后，交织着的是复杂和沉重的现实。

少年“杀人练手”

案件回放

5名少年最大16岁 最小13岁

警方侦查之初，彬县流浪汉之死一案扑朔迷离，谁会对一个捡破烂的流浪汉下此狠手？监控录像初步锁定了嫌犯——案发当日凌晨3时，有数名男青年到过现场。有人反映，有孩童玩耍时听同伴说：“6月16日晚，他们在广场把一个疯子杀了。”根据这条线索，案件很快得以侦破。杀人嫌犯是5个少年，最大的16岁，最小的13岁。他们原本是要抢劫，杀

死流浪汉则是为抢劫“练练手”。

陕西《华商报》、北京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，5个少年里，领头的叫小龙（化名，下同），今年16岁。被抓的时候，他正在距县城约10公里的老老家躲着。

小龙留着光头，黑黑瘦瘦，个子不高。他的脚上蹬着一双蓝色塑料拖鞋，格子衬衣只扣着倒数第二个扣子。他见到警员时并没有显得很害怕，就跟着警员走了。

预谋抢劫 买车票去北京打工

在审讯室，陪着儿子的小龙父亲双手抱胸，蜷缩着窝在角落。小龙坐在一旁，对警员说，他最大的目标是在县城迅速赚一笔钱，拿这笔钱买张去北京的车票，然后在那里继续打工赚钱。

为了筹路费，小龙在县城的一家火锅店打工，8天赚了不到100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。小龙花了60元在宾馆开了个房间，叫上几个同伴“开会”，并商量出了迅速赚钱的方法——抢劫。

他的策略是：在县城最热闹

的开元广场，趁晚上人们乘凉的时候，见谁有钱就“撂倒”谁，抢光他身上所有的东西，然后用抢来的钱打车去西安，再买火车票去北京。

参与这场“抢劫会议”的有小龙在火锅店打工认识的同伴，长得黑黑瘦瘦的小康排行老五，矮矮壮壮的胖子是老六，他们都叫小龙“二哥”。

另外两个新入伙的兄弟，是小龙在县城五星级酒店门口打群架时认识的。

抢劫失败 杀个流浪汉练练手

6月15日晚上，县城开元广场上聚集着纳凉的人。小龙说，他们打算当天实施抢劫，但看着背包的、戴项链的、打手机的人走来走去，谁都不敢动手，只好一次次退回来，在广场上坐着。

凌晨3时许，广场上除了小龙等5人，就只有睡在附近的流浪汉。小龙拿出事先买来壮胆的刀，看了一眼流浪汉，对胖子说：“没胆儿就赶紧给我滚，再不就过去那边，拿疯子练练手。”

正在睡觉的流浪汉从广场看台旁边的木头躺椅上坐起来，冲他们抱怨：“朝一边儿去，赶紧走！”流浪汉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唠叨。小龙骂他：“这广场是你睡的？去你X的！”

流浪汉回嘴：“我在这睡不睡，关你啥事？小屁娃，你X的！”

小龙掏出刀，冲向躺椅上的流浪汉，朝着他胸口刺了一刀。后来根据法医鉴定，这一刀直直刺中了心脏。

评论

教育真空 谁为少年犯负责？

为了一张火车票，5个天真的孩子却用他们的“明天”为赌注去赌了一把，造成这种状况的仅仅是他们父母的责任吗？谁应该为他们的今天负责？

1986年4月，中国颁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，要求适龄的“儿童和少年”必须接受9年义务教育。但在广大农村，辍学现象依然严重，这些本该坐在课堂上的孩子早早地进入了社会，染上了不良习气。农村的贫困在有些地方还很严重，父母目不识丁，不知道读书的重要性，或者“读书无用论”加上地方政府的不作为，使这些地方出现教育真空。大量儿童和少年流入社会，或乞讨或流浪，使孩子们的身心过早地受到了损害。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影响。谁该为这些孩子们的明天负责？

孩子们的梦在哪里？因为去过北京打过工，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，16岁的孩子只为求得一张去北京打工的火车票，铤而走险，用犯罪来赌明天，是他无知吗？一群13至16岁的少年，在自己还不懂得何为情义时就一起成为了混社会的“哥们”，他们缺乏社会知识和阅历，他们向往美好的事物，但他们除了贫穷还有什么？这起案件再次提醒我们的社会、学校、家长，孩子需要关怀关心和爱护，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舒适的成长环境是政府、学校、家庭应尽的义务。

人民网强国论坛

案件背景

主犯：小学毕业到北京打工

彬县县城里，小龙的同龄人这时还在为上学忙碌。一个跟小龙同龄的女生说，自己从小在县城读书，越读同学越少。成绩好的学生大多去了咸阳或者西安的重点中学；成绩不好的学生，尽管当地高中入学标准降到了200多分，可还是有大把人考不上，他们不愿交动辄上万元的赞助费，于是渐渐从课堂消失了，他们在网吧里或马路边消磨时光，也可能去了咸阳、西安甚至更远的城市打工。

读完了小学五年级，小龙便没有继续念书。小龙父亲说，儿子除了自己的名字外，不认识几个字。

小龙想去北京，两年前第一次去北京，还是老乡带他逃票坐火车去的。对北京生活的印象，小龙只有3个字：“好着嘞！”他在北京当过后厨，做过保安，还在肯德基做过冰激凌，每个月能赚三四千元，还包吃包住，尽管住的只是四五个人拼一间的地下室。

在北京，小龙谈了人生第一场恋爱，女朋友是同在宾馆打工的服务员。小龙说他前前后后给了女孩近1.3万元，叫她买衣服，或者寄给家里。后来，小龙发现这个女孩早就有男朋友，但他还是告诉女孩，“有事再来找我”。

小龙称自己在北京两年赚了4万元，还寄给了父亲1.7万元。但小龙的父亲说，从来没有收到

过儿子寄来的钱，他甚至很少接到儿子从北京打来的电话。

小龙的父亲也外出打过工，小龙7岁那年，他到深圳铺路，干了4年，带着几万元工钱和一身的疾病回家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盖房子。没多久小龙去了北京打工。两年后他把小龙从北京叫回来，儿子不仅个子长了，还学会了抽烟，胳膊上不知什么时候烙下了一个个圆形伤疤，像是被烟头烫过的。他要小龙待在家里看屋子，不愿意他再出去打工，“外面社会太复杂，我怕他出去出事”。

可是，待在家里对小龙来说太难熬了。小龙5岁那年，母亲跟人跑了，姐姐在外地打工，71岁的奶奶要下地干活，父亲要去地里挑麦子。在这个小村子，生活只有两种模式：出门种地，回家做饭。

小龙从小看着父亲用肩膀担着扁担，踩着泥走1公里山路，从村里往山上担肥料，从山上往家里担小麦，一亩地有时候得担个五六趟。小龙父亲今年48岁，这么担了半辈子担子，现在肩膀紧实得跟砖头一样，没法放松。

在看守所，小龙说，杀死流浪汉那天，他想要的真的只是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。他去北京打工，赚一笔钱，回来给父亲买一辆三轮摩托车，这样一来，父亲就不必扛着扁担一步步走着去担麦子了。

延伸：“经济十强县”的困境

在小龙打工的火锅店，领班厨师长说，打工者们常常讨论什么工作“最厉害”，结论是，好工作在煤矿。在县上不管打什么工，一个月最多一两千元钱，可在道听途说打探来的消息里，到了煤矿月收入就能上万元，虽然下矿有危险，但也得“有关系”才进得去。

近年来，彬县因为煤矿积累了财富，建起了气派的高楼。

2012年8月，《中国青年报》曾报道，陕西彬县由国家级贫困

县跨入“陕西省经济十强县”行列后，划拨1000万元用于少年宫建设。报道中提到，2011年，“仅9至12月，城区发生青少年打架案件6起，涉案48人，其中治安处罚17人，刑事拘留23人。6起案件中，4起有以刀伤人的情况。”彬县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8万人，占该县人口的1/4左右。“经济的富裕，不能催生道德的滑坡。”当时，民办教师出身的县委书记李建民如此表示。